

## 往事如昨



《张郎休妻》剧照

## 丁香的头发三尺长

焦辰龙

小时候,就盼着过年!  
过年好呀,过年不仅能吃好饭、穿新衣、放鞭炮,还能看戏呢!

那时,往往一迈进腊月的门槛,我们家附近的交通局、港务局、木帆社便开始排戏了,那欢快的锣鼓点、悠扬的乐曲声,使周边几条胡同的气氛骤然就热闹起来了。它分明是在提醒人们:哈!又快过年啦!

正月里演戏时,因为有许多道具要向老百姓借——跟张家借个包袱,跟李家借把扇子,跟王家借个托盘,跟吴家借个小锡壶……所以,邻舍本家们每天晚上都能得到一些赠送的戏票。那一张张油印的、盖着一个大红戳子的戏票,是大年正月里我们这些小孩的最爱。在对一出出传统戏曲的欣赏中,中国文化的思想性、艺术性,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我们尚未成型的世界观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。

上世纪50年代,中央戏剧学院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讲课。苏联专家接触了中国的戏曲之后,耸耸肩,把两手一摊,惊叹道:“你们请我们来讲课?——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!”中国戏曲是世界艺苑中的一朵奇葩。

1959年正月初九,天寒地冻,窗花绚烂;鹅毛大雪搅得天旋地转,犹如银马狂奔,玉龙飞舞。海员俱乐部二楼的大礼堂里,灯火通明,温暖如春,仙影飘飘,丝竹盈耳,交通局业余剧团正在演出吕剧《张郎休妻》。

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20多岁的男子,留着大背头,跷着二郎腿,脚蹬一双擦得贼亮的皮鞋,说话带点东县口音,看样子是从农村招上来的船员。

舞台上,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海棠莲步轻移,香气袭人,珠帘一挑,春光乍泄,犹如梨花一枝春带雨,又似红杏枝头春意闹。只见张郎的一双眼睛都亮了!

李海棠热情地把张郎迎进闺房,搔首弄姿,欲说还羞。张郎浑身的骨头都酥了,像一根青藤似地荡来荡去,围着盛开的海棠花打转……他终于把她的削肩蜂腰揽入怀中。她云鬓斜倚,眉目传情,娇喘细细……

这时,就见坐在我身旁的“大背头”的眼睛也亮了,木头条椅被他压得吱吱作响。

“嘿嘿……”他垂涎欲滴地笑道,“遇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们,谁不动心呀!”

舞台上,张郎也禁不住李海棠的诱惑,抛弃贤惠的发妻葛丁香,娶了李海棠。

几年之后,张郎的家底被好吃懒做的李海棠败坏净尽,张郎也在一场大火中被烧瞎了双眼。李海棠把脸一变,不顾张郎跪在地上苦苦哀求,一脚把他蹬了个趔趄,扬长而去!

这时,坐在我旁边的“大背头”气得鼻子都歪了,骂道:“……落我手里非一刀宰了她!”

舞台上,葛丁香被张郎赶出家门之后,与一个住在寒窑里的范姓少年再结连理。夫妻俩在寒窑旁开荒种地,土里刨金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瞎眼张郎沦为乞丐,沿街乞讨。有一天,他要饭来到了前妻葛丁香的门下。葛丁香又是哀怨又是怜悯,亲自上厨房给他下了一碗珍珠面,把一枚金戒指放在碗里,希望他能少受点儿饥寒之苦。

张郎把金戒指喝到嘴里之后,以为是石子硌牙,竟然把它吐到了地上。

葛丁香又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,缠一缠,放到碗里。张郎喝到那根头发之后,缓缓伸开,方知站在他面前的是何许人也。悠悠长发,绵绵余香,只有丁香才有呀!他羞愧难当,唱道:

丁香的头发三尺长,

羞杀我这负心郎。

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——  
一头撞死在锅台上!

这时,坐在我身边的“大背头”竟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,涕泗横流。一旁的人看到他那样子,都捂着嘴偷偷地笑。

散场后往剧场外走时,“大背头”若有所悟地说道:“唉!……还是包公说得对:糟糠之妻不下堂呀!”

回家之后,我把《张郎休妻》的故事讲给奶奶听,奶奶却说:“张郎以后成神了!”又指着贴在锅台后面的灶马说:“那灶王爷就是张郎。”

原来,在民间故事中,张郎乞讨到丁香家之后,思前想后,无地自容,一头钻到锅灶里烧死了。丁香念及旧情,就请人画了一张张郎的画像,贴在灶头上,烧香供奉。香烟袅袅,直上天庭。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之后,就封张郎为灶神。

张郎休妻和灶王爷的故事现在听起来有些搞笑,细细琢磨又觉得其中颇有几分意味。人们同情、喜爱丁香,因为她能够忍辱负重、置之死地而后生,表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;见到落魄的张郎之后,她也没有落井下石,反而以德报怨,暗中接济他,体现出中国人善良厚道的美德。从张郎羽化成仙的结局,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宽容与大度,允许人犯错误,允许人改正错误。张郎为了惩罚自己,羞而投入熊熊燃烧的灶火中。老天爷相信他知廉耻,能够痛改前非,于是就封他为灶神,让其监视人间善恶,年年回报上苍。

其实,所谓的老天爷就是人民群众,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是人民群众创作的。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,他们对犯错误的人不主张一棍子打死,而是主张给出路,让其改正错误,重做新人。表现好的还可以安排他干一定的领导工作,例如张郎。当然,这也是人民群众对“领导”的一种美好愿望,希望他们能够不辜负老百姓的殷切期望,为官一世,造福一方。

原上海人艺院长、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把中国戏曲命名为“梅兰芳体系”,将其与世界上著名的斯坦尼体系、布莱希特体系相提并论。他认为:这三大体系的区别是,斯坦尼体系极力要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立起一堵墙(第四堵墙),布莱希特体系极力要拆除这堵墙,而对于梅兰芳体系来说,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!

这话说得好,有形而上的象征意义。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老辈儿一些舞台的台柱子上就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:

舞台小世界,  
世界大舞台。

在人生的大舞台上,我们人人都是观众,同时也是演员。在舞台上扮演张郎的男子,在生活中也许是一个与妻子琴瑟和鸣的好丈夫;扮演李海棠的女子,在生活中也许是一个举案齐眉的小孟光;看戏时坐在我旁边的“大背头”,也许当时正和农村的发妻闹离婚,隔着戏里的张郎只有一步之遥了,一出《张郎休妻》,把他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。

这些年来,由于各种原因,我很少进剧场了。晚饭之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,倒也其乐融融。可是,三五个人面对光影变幻的电视,与千百人共同欣赏一场舞台演出,其气氛、感觉、收获,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歌未竟,东方白。”抚今追昔,我怀念自己美丽工作着的中年,激情燃烧的青年,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少年,更怀念无忧无虑、盼望着过年的童年。

童年,是人生的早晨。

## 忆昔少年读书时

王吉永

—

上世纪50年代,我在烟台搬运工子女小学读五年级时,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刘宝玲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。用她的话说,这是她第一次走上讲台,也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。当时,刘老师才18岁,比班上的大同学只大两三岁。

校园向北不远是芝罘湾。当年芝罘湾因多年淤泥沉积,沿岸水很浅,特别是西南河入海口以东那片海,退潮时能退出一大片陆地,聚集起很多赶海的人来挖大黑皮蛤。搬运工子女小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若是赶上下午四五点钟退潮,我们班学生最后那节活动课去赶海的现象屡禁不止。

刘老师没把这件事告诉校长,而是用成立“图书角”的办法吸引大家。她让全班同学每人带两三本故事书,成立了“图书角”。同学们推选我担任负责人,可以找我借书,借期最多一周。每天最后一节活动课为阅读、朗诵课,上半节课阅读,下半节课把看过的故事用普通话讲述给全班同学听,每个同学都不准缺课。还别说,刘老师这一招真灵,不仅形成了全班读书的好风气,还提高了同学们说普通话的水平,班级学习成绩也得到很大提升。对我而言,近水楼台,一下子拥有更多的书可以看,不但解决了没有钱买课外书的困境,而且久而久之,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。

—

看书要有看书的条件,起码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我朝思暮想,若有一间小书房那该多好啊!可是,家中人口多,住房并不宽绰,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那间平日存放柴草杂物的小厢屋。然而,小厢屋的柴草放到哪儿?一张床20多元钱从哪里来?小厢屋没有电怎么办?

为了早日拥有理想中的书房,我一直在谋划着解决这些困难。机会终于来了,在我小升初统考后的那个暑假,没有学习压力,我利用这段时间爬到了小棚子顶上,把四片碎瓦撤上去,把我在街上捡的几片小黑瓦放上,并在瓦下面垫了些黄泥。然后,我把小厢屋的柴草、杂物蚂蚁搬家一般一一搬进了小棚子。小厢屋方方正正,尽管只有5平方米,但清理完后还是挺宽敞的。我安上一个一米多长的书桌,又设计了一铺一米多宽的小炕,感觉屋里的活动余地仍然挺大的。

妈妈请她单位的赵师傅帮忙,垒了一铺长两米一、宽一米一的小炕,下面有炕洞可以烧柴草热炕,睡觉的问题解决了。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照明问题,爸爸和我都不懂电工,好在暂时可以用煤油灯照明,读书也不耽误。

1959年我上初中三年级,一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书,如《苦菜花》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,每本都是1元左右,深受中学生喜欢。然而,父母每月微薄的工资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已是不易,哪有多余的

钱给我买课外书。班上能买得起课外书的同学寥寥无几,僧多粥少,大家便互相借阅,常常是一本五六百页的故事书,最多看三天就要转交给下一位同学。

于是,我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:每天最后两节活动课,必须做完当天的作业。我还一度把走路的时间也用于看书。那时马路上车很少,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书,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被车撞着,但有几次我差点撞上了大树。

回家匆匆吃完晚饭后,我就立马回到自己的小厢屋里,坐在被窝里开夜车看课外书,直看到昏昏欲睡方才罢休。

三

用着煤油灯,连续多日开夜车看书,我终于闯祸了。一天夜里,我在睡梦中被浓烟呛醒,只见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被我碰翻,煤油全部洒在棉被上并引着了火,靠桌子近的那个被角已经烧了一个蒲扇大的洞,火苗还在继续蔓延,书房里充满焦糊味儿的浓烟。我一个高儿从床上跳出去,从院子里的潋水缸里舀了一脸盆水,用湿透的毛巾把那些火苗全部按灭,并把门开到最大,用扇子扇风,只怕妈妈发现我把被子烧了。当年置床新被子可真不容易,我那床被子是爸妈觉得厢屋太冷特意送我的厚被子,还是找人把棉花弹了,拆洗后专门给我做的。

思来想去,我把着火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遍,确定不可能死灰复燃后,再用干毛巾把用水浸过的地方尽量吸干。然后,我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,把有窟窿那头叠在里面。炕面、地面和桌面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,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为了跑气味,门一直开着,冬天的寒风吹进厢屋里,一点热乎的东西都没有,我呆呆地坐等天亮。

白天一整天,我心中都忐忑不安,充满负罪感。晚上没有回家,我躲进了学生食堂的柴草棚里猫着。那一夜又冷又怕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不料,第二天一早,我就看见妈妈站在距教室不远的地方四处张望。躲避已来不及,我索性硬着头皮迎上去,准备接受惩罚。没想到妈妈并没打我,只是焦急地问:“你昨晚去哪里了?我们找你半宿……”

两个月后,我读初三下学期,物理课学“电学”。我吃过没有电的苦头,心想一定要学好电学,自己给小厢屋拉上电。这种主观能动性促使我对电学特别感兴趣,喜欢做实验、设计电路、自己动手操作。学习完毕,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就近的志达五交化商店,花了两元多钱买了灯口、灯泡、三米双股软线、拉线开关、电工胶布等。回家后我立马动工,不到中午就安装完毕。当电灯亮起来的那一刻,我心中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!

从此,我告别了煤油灯,再也不用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了,再也不用担心用煤油灯看书惹祸了,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长大了的感觉。